

國立北平圖書館

惠存

作者贈
為子初夏

文以載道辨

沈心蕪

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二期單行本



ME
I206.2
25

文以載「道」辨

沈心蕪

中國的文學家，尤其是唐代以後一般所謂「古文家」者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將「文」與「道」打成一片的。自隋唐到清末一千二百年間，中國文壇差不多完全被這個烏煙瘴氣的「道」所籠罩，所霸佔。凡自命為正統派的文學家，對於文以載「道」這個信條，均不敢略持異議，也是見牠的威權之偉大與普遍了。不過提起「文」與「道」的關係來，有「明道」，「貫道」，「載道」種種之不同。我這裏所說的是文以載「道」，而不是專指周敦頤的「文以載道」，但是這「文以載道」已經包括在文以載「道」之內。我只是想探討古文家所謂「道」的內容，說明「文」「道」結合的情況與原因，批評文以載「道」的錯誤；並非要區別「明」「貫」「載」幾個動詞與「道」的關係之深淺輕重。這是我要鄭重聲明的。

一

提起文以載「道」的問題，第一個使我們發生疑問的，便是古文家所謂之「道」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？古文家所謂之「道」，既不是老子上所謂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」的道，也

不是莊子中所謂「寂寞無形，變化無常，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」的道。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，是儒家之道，孔子之道。但是，我們須要知道，古文家雖以「道」為孔子學說的代表，孔子自己卻沒有這樣說過。論語言及道者有三十餘則，以



其性質言，約略可以別爲三類。有指「仁義道德」而言者，如：

『學而篇：『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，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』

——那魯疏：『有道謂有道德者。』

『季氏篇：『孔子曰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』——那魯疏：『行義以達其道者，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。』

有指「禮樂」而言者，如：

『八佾篇：『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』——那魯疏：『此章明古禮也。……「古之道也」者，結上二事，皆前古所行之道也。』

『陽貨篇：『子游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』——孔安國註：

『道謂禮樂也。樂以和人，人和則易使。』

有指「自然之道」而言者，如：

『述而篇：『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。」』——皇侃義疏：『道者，通而不壅者也。』

『那魯疏亦云：『道者，虛通無壅，自然之謂也。』

『衛靈公篇：『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』——那魯疏：『道者，通物之名，虛無妙用，不可須臾離。』

441

可知孔子雖然說過「道」，却與古文家所謂之「道」不同，更沒有說「道」即是他自己的學說。

後來孟子以仁義爲先王之道，荀子以禮樂爲先王之道，道的範圍始由廣而狹了。

到了漢代，出來一位「孔子之文在仲舒」（王陽明語）的董聖人，他曾向漢武帝上過「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」的對策，立下了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的汗馬功勞，對於孔子的學說自然是發揚之不遺餘力了。他在賢良對策裏說：

『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。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受，而守一道。』

又說：

『道者，所繇適於治之路也。仁，義，禮，樂，皆其具也。』

儒家的學說，到此時才算有了定形。

不久又出來一位假古董揚雄，他雖然做過王莽的大夫，作過美新（蜀漢）以歌頌王莽的功德，但對於孔子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，無以復加。他在法言問道篇上說：

『道也者，通也，無不通也。……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，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。』

楊雄竟不讓董仲舒「專美於前」，也要把整個的天下交給儒家獨佔了。他又在學行篇裏說：

『天之道不在仲尼乎？』——李軌注：『不在，在也，言在仲尼也。』

又進一步，「道」變作了孔子一人的私產。

到了唐代，韓愈出來，儒家的道更來得系統化了。他在原道上說：

『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，孔子以是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』

這張家譜，開列得多麼清楚呀！古文家所謂之「道」，便是這些聖人們遞相傳授的那個「道」。

自韓氏以後，而宋，而明，而清，一般古文家無不認為「道」是儒家的貨物，孔子的私產。但是這種私產在什麼地方儲藏着呢？那不消說，自然是「聖人之道在六經」。虞夏商了。揚雄在法言「吾子篇」上說：

『舍舟航而濟乎讀者末矣，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。』

欲「濟乎道」既是「舍五經」而無由，則五經中所載為「道」

自不待言。漢清劉宗周傳裏說：

『賢人見經，然後知人道之務，則詩齊易春秋禮樂是也。』

這就是說：「六經所載者，皆人之道也」。韓愈在原道中說：

『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？……其文：詩，書，易，春秋，……斯吾所謂道也。』

歐陽修在答張秀才第二書中也說：

『其道，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面行之者是也；其文，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』

周孔之大道既載在六經之內，所以歷代的古文家除了主張文以載「道」之外，又都異口同聲的主張「宗經」。這樣，問題又來了，六經中所載之「道」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？關於這一層，一般古文家都沒有明說過，據我個人的推測，無非是些詩家所愛講的「美刺」，春秋家所喜道的「當褒貶，別善惡」等等之類的東西罷了。不過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，詩經所載的是古代的「歌謠」，書經所載的是古代的「告示」，禮經（儀禮）是一本「禮節單」，易經是一本「算卦書」，春秋是一本「斷爛朝報」，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大道理在裏面。然而說的人——歷代古文家當作「像煞有介事」的說了，聽的人也當作「像煞有介事」的聽了；不但聽了，而且信了。

一一

我們既明白了古文家所謂「道」是什麼，第二個疑問便跟着發生了，最初將「文」與「道」拉在一起的是那位先生呢？提到這個，自然不能不先向記載孔子言論的《論語》中去尋求。《論語》中言及道者有三十餘則，在前面我已說過；言及文者有八則；言及文章者有兩則；言及文學者有一則。孔子雖然也談過「道」，也論過「文」，但並沒有將「文」與「道」拉在一起，更沒有說過「文」為載「道」的工具。這一點，我們是應當特別注意的。

後來荀子出來，他的論文主張頗近於「載道」之說。他在《非十二子》篇上說：

『多言而類，聖人也；少言而法，君子也；多少無法而流滯然，雖辯，小人也。……辨說譬喻，齊給便利而不顧禮義，謂之姦說。……聖人之所禁也。』

在《非相篇》裏也說：

『凡言不合先王，不顧禮義，謂之姦言。』

後人論文主「載道」，未嘗不受荀子思想的影響，但荀子却也不會明言「文」為載「道」之工具。

到了南北朝時，出來一位文學批評家劉勰，他眼見當時

文風之萎靡，於是便倡言「文以明道」說以矯正之。他在《文心雕龍·源流》篇上說：

『爰自風姓，暨於孔氏，玄聖御典，素王述訓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。……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以明道，旁通而無滯，日用而不置。揚曰：「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」，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適道之文也。』

據「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以明道」，及「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適道之文也」看來，似乎劉氏主張「文以明道」之說，但劉氏又說過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」（《文心雕龍·原道》）及「人秉七情，應物斯感；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」（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）一類的話，可見劉氏論文雖一面主張「明道說」，而另一面又主張「自然論」，與後來韓柳等一味主張「明道」者尚有些不同。

隋唐初時，有一位怪儒王通，他模倣着《論語》作了一部《中說》，對於孔子的學說大加發揚。他在《天地篇》裏說：

『學者博通云乎哉？必也貫乎道；文者衍作云乎哉？必也濟乎義。』

這與後來周敦頤的「文以載道」說何以異！不過王通同周敦頤一樣，是個學者，不是個文士，也難怪他說這樣的話。

不久辭愈出來，他爲了「起八代之衰」，他打算作一個「文德兼備」的完人，於是抱了一種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」的宗旨，才有意的大聲疾呼的倡言「文以明道」。他在題歐陽生哀辭後上說：

『愈之爲古文，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？思古人而不見，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。通其辭者，本志乎道者也。』

在答李秀才書中說：

『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』

在答尉遲生書中也說：

『所能言者，皆古之道。』

一則曰，「通其辭者，本志乎道者也」；再則曰，「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耳」；三則曰，「所能言者，皆古之道」。張口也是道，閉口也是道，大有「將復古道，捨我其誰」之概！無怪乎張籍說：『自揚子雲作法言，至今近千載，莫有言聖人之道者，言之者惟執事（韓愈）焉耳。』（韓愈）

柳宗元與韓愈同時，其在文學造詣上與韓雖不相同，但論文主張「明道」與韓並無二致。其答韋中立書云：

『始吾幼且小，爲文章以辭爲工；及長，乃知文者以

明道，是固不啻爲炳炳烺烺，務采色，夸聲音，而以爲能也。』

他在報崔黯秀才書中也說：

『聖人之文，期以明道，學者務求其道而遺其辭。辭之傳於世者，必由於書。道假辭而明，辭假書而傳，要之之道而已矣。』

韓柳二人想改革六朝以來柔靡淫詭的文風，他們深知道社會人士「榮古陋今」，「貴德賤文」的心理，於是不得不扛出「明道」的招牌，藉以增加言論的效力。所以韓柳倡言「文以明道」，乃是「復古的革新」，乃是「託古改文」。

（唐書爲韓亂子爲「花古改制」，今襲其語，稱韓爲「託古改文」。）

自從「文」小姐與「道」先生由韓柳二位大媒的介紹，因之結了婚，二者的關係便密切了。後來一般古文家知道這門親事是韓柳作媒人的，於是人云亦云的都在慶祝「文」與「道」的「夫唱婦隨」，「白頭到老」。

古文至晚唐五代雖經一度衰落，但到宋初又勃興了。當時的論文主張，那不用說，自然是與韓柳同聲調的。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云：

『聖人之文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，文不難而自至也。……後之惑者，徒見前世之文傳，以爲學者文而

已，故愈勤而愈不至。此足下所謂「終日不出軒序，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」者，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，雖行乎天地，入於淵泉，無不之也。」

曾國藩答李鴻章書云：

「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。信如是，是足下之有志乎道，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。末曰「其發憤而爲詞章，則自謂淺俗而不明，不若其始思之銳也」，乃欲以是質於予。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，欲至乎道也；而所質者，則辭也；無乃務其淺，忘其深，常急者反徐之歟？夫道之大歸非他，欲其得諸心，充諸力，擴而充之，國家天下而已；非汲汲乎辭也！其所以不已乎辭者，非得已也！」

曾氏二人之言，宛如出自韓柳之口，所謂「同一鼻孔出氣」者是也。

降至明代，文壇上復古之風正熾，一般古文家論文主張「載道」，自不待言。歸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云：

「文者，道之所形也。道形而成文，其言適與道稱。」

……夫道勝，則文不期少而自少；道不勝，則文不期多而自多。溢於文，非道之贅哉？」

「溢於文」爲「道之贅」，便是以道爲主，以文爲副了。

480

到了清代，文壇上仍繼承着復古的風氣，一般古文家的論文主張，也不問可知。姚鼐答翁學士書云：

「夫道有是非，而技有美惡。詩文皆技也；技之精者必近道。」

曾國藩答劉孟蓉書云：

「周濂溪氏稱「文以載道」，而以虛車議俗儒。夫虛車誠不可，無車，又何以行遠乎？孔子歿，而道至今存者，賴有此行遠之車也。吾輩今日苟有所見，而欲爲行遠之計，可不早具堅車乎哉！」

姚氏論文雖主張義理，考據，詞章，三者並重；但稱詩文爲「技」，不免有些重道輕文之意。曾氏主「早具堅車」，似是重文，但有了「堅車」之後，仍不能不拿去作爲「載道」之用。

以上所舉雖甚簡單，但由那些簡單的文句中，也很可看出歷代古文家言「道」的情況，我們不必再舉出許多這樣大同小異的例子。

三、

我們既明白了歷代古文家言「道」的情況，跟着便發生了第三個疑問——古文家爲什麼要把「文」與「道」拉在一

起呢？提到這個問題，便不能不說與歷代「重道德」，「輕文藝」，「貴儒學」，「賤文士」之思想有密切的關係了。
論語憲問篇云：

『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』

這顯而易見的是重道德輕言辭的思想。又學而篇云：

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

如無「餘力」時，自然就不學「文」，亦可見「文」不如「行」之重要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叔孫豹對范宣子曰：

『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』

『夫立言豈聖人之得已哉？蓋聖人以拯救天下爲心，德無其位，功非其時，不得已徒託之空言。』（宋）周惲承與范宣子聖人在不能「立德」「立功」時，才不得已而「立言」，「立言」自然不如「立德」「立功」之可貴了。揚雄在法言「君子」篇中說：

『或問：「吾子少而好賦」，曰：「然。童子雖蟲象刻」，
俄而曰：「壯夫不爲也」！』

這與漢書文志稱小說爲「君子非爲」，可謂異曲同工。
曹植與楊德祖書云：

『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揚大義，彰示來世也。』
辭賦既是「小道」，當然不會爲人所重視。這種思想演進至

宋代，更來得變本加厲，甚至有以「爲文」爲「玩物喪志」者。程頤云：

『問作文害道否？曰害也。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，若專意則志局於此，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！』書曰：「玩物喪志」，爲文亦玩物也。』

明代朱舜水則以「文」爲「無用」。他在與與村庸禮書中云：

『吟詩作賦，非學也；而廢日棄時，必不可者也。』
「空築落燕泥」，工則工矣；曾何益於治理？「僧推月下門」，嚴則嚴矣，曾何補於民事？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新則新矣；曾何當於事理？』

詩文既不爲世人所重視，而寫詩文的文人當然也因之不爲社會所景仰。這真是所謂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」了。

文士既不爲社會人士所重視，那些既不能「立德」又不能「立功」的文士們，想一種什麼方法能在社會上站住腳步而使社會人士重視自己呢？於是不得不變一套「狐假虎威」的把戲了。

前面已經說過，當韓柳改革文風，提倡古文時，他們很知道社會人士「榮古陋今」，「貴德賤文」的心理，同時他們又知道儒家思想在社會上的勢力之偉大，於是生吞活剝的硬把周公孔子拉來作他們的祖師，他們便作了聖門的高足，替

往哲先賢宣傳聖功大道。這樣一來，誰敢不尊崇古文家？誰敢藐視古文？不尊崇古文家便是不尊崇周公孔子，藐視古文便等於藐視六經。因之古文家——文士在社會上的地位隨之提高而且穩固了。

後來一般古文家見韓柳這個戲法變得好，變得妙，於是你也稱「經」，我也言「道」，致使唐以後的文壇充滿了酸腐的「經氣」與「道氣」。

這個戲法變了一千多年，變者自變，看者自看，誰也不敢把這個戲法的內幕揭破，而且誰也不知道揭破！要知道，誰揭破誰就是「離經叛道」的罪人，誰不主張文以載「道」誰就是「缺德的文人」啊！

到了明代，公安竟陵兩文派曾揭起了反叛的旗幟。袁宏道江進之等云：

『世道既變，文亦因之；今之不必摹古，亦勢也。……人物事虛，有時而更；鄉語方言，有時而易；事今日之事，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。』

可惜只是側面的消極的主張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以排斥復古，並非正面的積極的反抗「文以載道」。

直至清初，才有人對於「文以載道」之說起了懷疑。阮曉陳鶴公論文書云：

500

『嘗聞儒者之言曰：「文者，載道之器」，又曰：「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」，僕竊謂此言已少夸矣！古之載道之文，六經潛孟而下，惟周子之通書，張子之東西銘，程朱二子之傳注，庶幾近之；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譏，而况他文乎！』

阮氏已知古文家主張文以載「道」有些夸大不實了。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云：

『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，上者好言道，……說者曰：「言道者，言之有物也。」……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。子思嘆聖道之大，曰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。孟子明王道，而所言要於不殺民事，以養以教；至養民之制，教民之法，則亦無不本於禮。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，自退之始，而子厚和之。至明允永叔適用力於推究世事，而子瞻尤爲達者；然門面言道之語，滌除未盡。以致近世治古文學者，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，是非世臣之所敢知也！』

包氏稱韓愈爲「虛言道以張其軍」，不就是上面所說「狐假虎威」之意嗎？而「是非世臣之所敢知也」一句，尤有言外之意，絃外之音。但直提了當的揭破古文家主張「文以載道」的內幕，寫得體無完膚者，莫過於袁枚。袁氏客友人何文

二書云：

「三代而後，聖人不生，文之興道離也久矣！然文人士，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，故一則曰『明道』，再則曰『明道』，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；而推究作者之心，都是道其所道，宋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！」古文家所以主張文以載「道」者，原來是爲「有所挾持以占地步」呀！千餘年來人所不能說不敢說者，今竟被袁氏說出來了，袁氏真堪稱爲「世人皆濁我獨清，衆人皆醉我獨醒」的人！

袁氏雖然是個清醒人，可惜只是一個，其餘的人都還在夢中酣睡呢！袁氏明睡了半天，不但沒有把他們從夢中喚醒，他們反而怪袁氏騷擾亂鬧，打擾他們不得安眠。到了民國初年，有人從歐美調來許多餓殍人馬，才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從夢中喚醒。真不容易！

四

我們既明白了以上三個問題，現在再來批評古文家所主張的文以載「道」的是非。古文家所主張的文以載「道」，有兩種極大的缺點：

(1) 時間上的缺點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精神，一時

代有一時代的文學。文學家必須有遠大的眼光，敏銳的感覺，不特能表現時代，反映時代，並且要站在時代的前面，領導着人羣。這樣的文學家，才不愧稱作文學家；這樣文學家的作品，才算有價值的作品！一般主張文以載「道」的古文家，不但不能站在時代的前面，反而站在時代的後面；不特不能作爲時代的前驅，反而作爲時代的後驅了。他們所謂之「道」，是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的「道」，是數千年前的陳腐古老的「道」，是已經死去的「道」。他們的作品，也的確確成爲「死文學」了。這是古文家所主張的文以載「道」在時間上的缺點。

(2) 空間上的缺點 歐美研究文學者有一句最普遍的標語：「文學是人生的反映 (Reflection)」。人們怎樣生活，社會怎樣情形，文學就把那種情形反映出來。假使人生是個杯子，文學就是那杯子在鏡中的影子。可是人生是很複雜的，有善也有惡，有美也有醜。文學既是人生的表現，就應赤裸裸的不加掩飾的把牠們的真實表現出來。古文家所主張的文以載「道」——替古聖先賢宣傳大道理，只是從複雜的人生中抽出極小極少的一部分。若拿這一部分與複雜的人

生相比，恐怕比滄海之一粟，九牛之一毛還要少哩！那一大部分，古文家戴上了道德的眼鏡看不見牠們了，古文家拿起道德的大斧把牠們劈去了。這是古文家所主張的文以載「道」在空間上的缺點。

有人說，古文家主張文以載「道」，並非完全是門面語，你沒有看見「文亡於六朝，韓愈振之；文亡於五代，歐陽修振之」嗎？凡是文壇上的風氣趨於淫靡靡麗，祇講外形不重內容之時，必有人起來提倡「載道說」以矯正之，改革之。可見古文家所謂「道」，乃是「言之有物」的意思。這話從表面上看來，不無相當理由；實在說起來，「道」與「言之有物」，牠倆有着很大的區別的。

胡適在民國初年，爲了改良中國文學，曾提出「八不主義」(見文學改良議)，而第一個便是「須言之有物」。胡氏恐怕人們不能徹底明瞭「言之有物」的真意義，於是又在下面加了一番詳細的解釋。他說：

『吾所謂「物」，非古人所謂「文以載道」之說也。吾所謂「物」，約有二事：

一，情感。詩序曰：「情動於中而形諸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；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」。此吾

所謂情感也。情感者，文學之靈魂。文學而無情感，如人之無魂，木偶而已！行屍走肉而已！(今人所謂美感者，亦情感之一也。)

二，思想。吾所謂思想，蓋兼見地，識力，理想，三者而言之。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；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，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。此莊周之文，淵明老杜之詩，稼軒之詞，施耐庵之小說，所以負絕千古也！思想之在文學，猶腦筋之在人身，人不能思想，雖面目姣好，雖能笑啼感發，亦何足取哉！文學亦猶是耳。

文學無此二物，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；雖有瓊麗富厚之外觀，抑亦末矣！」

情感和思想是文學的基本要素，一種文學作品若沒有真摯的情感與新穎的思想，必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，必不能成爲偉大的名著！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，與這裏所謂「思想」有些相近似，但其中絕無情感的成分，也許一般古文家根本就不知道人生天地間有情感的這樣東西！而其所謂「思想」，並不是新穎的思想，乃是陳腐的落伍的不合時代的思想，是拘縛性靈的桎梏，是約束情感的銬鎖，是阻礙文學自由發展的

銅牆鐵壁！

文學有兩種力量：一種是「教」，一種是「感」，而「感」尤為重要。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，只有淺薄的「教」的力量，沒有深厚的「感」的力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古文家所謂「道」，其中沒有情感的緣故！

文學有三種目的：就是「求真」，「求美」，「求善」。

（也有人說，科學的目的是求真，文學的目的是求美，哲學的目的是求善。）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，只重在「求善」，而忽略了「真」與「美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，其中沒有情感的緣故！

所以古文家的文章，其不載道者，倒是文學作品；其載道者，反是木偶而已！行屍走肉而已！無怪乎知堂老人說：『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，六朝的駢體文也的確被他打倒了，但他的文章，即使最有名的祭柳宗元文，據我們看來，實在作得不好。僅有的幾篇好些的，是在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寫出的。』（中國新文學運動）我們若把韓愈的原道原性諸篇與他的祭十二郎文一比，便知周先生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了。所以凡以「言之有物」來解釋古文家之所謂「道」者，都是古文的保鏢者替古文辯護而欺蒙世人的！

一九三六，四，一，燕京大學。



沈心堉先生贈送

